

四平曾经最辉煌的老国企 ——联合化工厂的故事

侯景宝

传统报纸受互联网的影响，影响力不如之前大了，可想当年一张小报那是我们厂的骄傲。

一张报纸，刊登厂里的大事小情，工人们管这一份土得掉渣的小报，亲切地叫“厂报”。我与厂报结缘是在1988年，刚参加工作。有一天，塑料车间的同事吴姐拿一张联化工人报，对我说：侯老弟，喜欢写点东西，可以投稿，姐帮你送去，还有稿费呢。我那时是三班倒的工人，第一次听说有厂报。于是就尝试着写几篇豆腐块的小文章。至今我还记得，第一次看到我名字变成铅字的那个情景。那天我到二车间盐水工段找同学二根去玩，他从塑料车间

被借调到盐水工段砸盐块，我一进休息室，他就对我说，哥们，你写的文章登报了，我当时有点小激动。文章题目是《水》，我至今还记忆犹新，它为我增添了很多信心和激情，于是在工作之余，就经常往厂报投稿，每当厂报上出现我的名字，心里就美滋滋的。我1988年入厂当工人，到1995年提拔为总厂团委副书记，厂报一直陪伴我成长。如果没有这个平台，我的写作能力不可能提高；如果没有这个平台，我的名字也不可能让大家知晓。记忆中，厂报随着联合化的兴衰，经历了创办、发展、辉煌、没落几个阶段。厂报最初创办时，都是手写稿，然

后去四平日报社铅字印刷。最早是一月一期，后来一月两到三期。厂报最初叫《联化工人》，后来叫《四平化工》，1993年划归中化集团，更名为《中化四平报》。姜文明的摄影作品经常在省市报刊、工人日报、中国化工报上发表，1992年以后，他撰写的企业新闻和新闻摄影作品多次登上《人民日报》。厂报是老国企的一个标志，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，适合怀旧的季节，我们缅怀，向那个充满情怀的老国企年代致敬。青春散场，不诉离殇。怀念啊，那个油墨飘香、苦中作乐的年代，那些点灯熬夜爬格子的夜晚……

联合化的广播站隶属于厂党委宣传部。业务有两大部分，一部分是通过大喇叭对厂区播音；另一个是通过有线电视台，对住楼房的家属区播放厂内新闻，同时转播凤凰卫视中文台及其他电视台的节目。住平房的家属区是收看不到的。联合化在当时也算是有名气的单位，因为，那时候在四平市区内能收看到凤凰卫视台也是不容易的。说起广播站，那是联合化工厂的一个符号，是几代联合化人的一份情怀，是大家共同拥有的记忆点。每天播音4次，不知不觉成了职工们上下班的信号。每天清晨，迎着旭日朝阳，合着欢快的乐曲，听着熟悉的声音，开启了新的一天，迎接职工们走进厂区、走进车间、走进联合化这个大家庭。因为一家老小的生计都和它息息相关，它的荣辱兴衰也无时无刻地牵动着一代人的衣食冷暖。每当下班时，喇叭一响，大家都陆陆续续从各自的车间、科室走出来，汇集在厂区的主干道，然后再熙熙攘攘、连说带笑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听我岳父说，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岳母曾担任过广播站的播音员，梳着两条大辫子，甜美的笑容、清脆的嗓音，在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，给我岳父带来了浪漫与温情。我1988年职业高中毕业，被分配到塑料车间当工人，经常往广播站投稿，在大喇叭中常听到“通讯员侯景宝报道”的声音，这样我的名字渐渐被大家熟悉了，为我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联合化也有它自己独特的酒文化，每次讲这个话题，都得从铝饭盒聊起。1988年我参加工作，带饭盒上班是那个时候的标配。每个车间都有个大蒸锅，专人管理，定点开关。每到开饭的时候，班上的同事都会聚在一起，把各自带来的菜凑在一起，没有人会吝啬自己的肉菜被别人吃，也没有人为自己的素菜上不了台面而自卑，大家和和气气的互通有无，也许是孩子是自家的好，饭菜是别人家的香，吃饭的时候，都是在你推我让，嘻嘻哈哈的欢笑中度过的。男同志们比较喜欢四点班，因为车间领导们白班都下班了，四点班可以偷偷地喝点酒，就用饭盒盖装酒，别看不起眼，但真能装

很多，比如二十五中附近的烧烤，几个马扎，围着炉子，烤着奶盒子，就着宴丰小烧；比如盐水工段的徐哥那句经典话：哥喝酒不挑，能把我整迷糊的那个就行；比如经常去蔡三哥家，吃嫂子吴丽萍包的包子等。

联合化工厂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，就像陈年的酒，越品越香，多少人在这里出生，在化工厂附近的大街小巷留下了青葱的记忆；多少人在这里奋斗，从黑发到白发，从荒烟蔓草披荆斩棘，到白发苍苍，和化工城融为一体；多少人从这里奔向远方，却留下了难以割舍的羁绊，直到地老天荒。（下）

首任梨树县委书记沈亚钢

单志

二、沈亚刚在梨树组建县委、县政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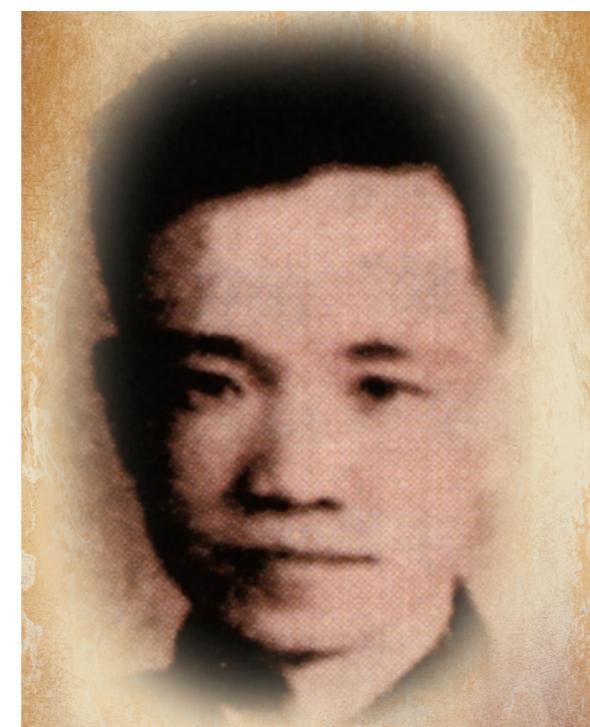
1941年5月，沈亚刚在冀南党校参加整风运动。1944年，受党组织调遣，沈亚刚同爱人马庚等四人一起去延安，在延安党校带病参加整风学习，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整风文献。

1945年6月，参加延安整风，使沈亚刚在政治思想方面有了飞跃性的提高。

“九三”胜利后，中共中央及时向党内发出“向北发展，向南防御”的指示。从关内调入11万主力部队和2万余干部，从陆海两路向东北进军。沈亚刚随东北干部队伍，在总队长张秀山的带领下，于1945年10月到达沈阳，正赶上党中央指示“让开大路，占领两厢”，东北局给每个人写了条子，让每个人自己去四平。沈亚刚、马庚等在沈阳短暂休整，第四天，扒运煤车来到四平，接待他们的是苏联红军司令部人员，他们找到辽北省委以后，辽北省委留沈亚刚任宣传部副部长。

10月下旬，辽北省委派秘书周健接收梨树，周健带领警卫员李有贵，两匹马，三支枪来梨树组建民主政府。10月末，辽北省委派沈亚刚到梨树县任县委书记，并派来马庚、吴培恩、刘启新等人组建梨树县委加强县民主政府力量。县委成立后，驻在伪县长公馆里，当时斗争形势极其严峻，明有国民党保安队、政治土匪的袭击，暗有特务反动地主武装、地痞流氓的破坏。社会动荡不安，秩序十分混乱，加之群众的觉悟不高，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部队持怀疑态度。沈亚刚和周健带领县委和县民主政府工作人员克服重重困难，对反动力势采取打击、清查、瓦解等方法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，积极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，削弱敌人，壮大革命力量，同时在辽北省军区所属部队的配合下，强行解散国民党保安队，组建起县武装大队，沈亚刚任县武装大队政委。同期，组建各区工作委员和区政府，10月组建起七区孤家子、八区刘家馆子、九区喇嘛甸区工委、区政府。11月和12月先后建起六区榆树台、五区小城子、四区万发街区工委、区政府；1946年1月建起一区梨树区工委、区政府；2月建起三区郭家店区工委、区政府。

1945年11月，县委举办第一批干部培训班，吸收伪县公署部分职员、进步青年、爱国学生共30多名参加培训，沈亚刚亲自讲课，通过具体事例讲解革命道理，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和斗争观念。通过一个月的培训，这些学员成为梨树县解放初期革命斗争的骨干力量，选拔到县、区机关参加工作。在此后的实际斗争中吸收先进的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知识分子加入党的组织。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5月，共发展党员30多名，壮大了党的队伍，也充实了干部分队伍。



1945年底，沈亚刚带领县委、县民主政府，以梨树城區为中心，开展反霸和清算敌伪资产的斗争。没收了伪县长崔宝山和匪首王永清的财产，清算了富盛泉、郑家油坊等八大商号的财产。把这些财产分给穷苦大众。对十恶不赦的恶霸、地主、汉奸进行公审、公判。在斗争一贯彻打骂群众的吴振中（吴小巴掌）大会上，沈亚刚义愤填膺，狠狠地打了吴振中（吴小巴掌）一个嘴巴，让他感受被打群众的滋味，之后押到西门外执行枪决。

四平保卫战期间，沈亚刚随东北民主联军战斗在四平前线。5月18日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前线指挥部和主力部队奉命撤离梨树和四平，凌晨三点多钟，沈亚刚随北撤部队到达榆树台，他叫醒为稳住蒙匪而喝醉酒的马庚，一边召集全区工作人员销毁文件，开库清仓，粮食就地分给老百姓，布匹送给部队，钱币和枪械物资装袋打包，装车带走。一边召集老、弱、病、残人员和家属准备先行撤离，这时县机关支部书记赵芝哲等率领的老、弱、病、残和家属的车队已经到达。沈亚刚为保证这些人员的安全，调来10名警卫、10匹马、全部短枪，由马庚、赵芝哲两人负责，先行撤往双山，其他人员武装待命，准备策应梨树的部队。（三）

第二编 四平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(1931年9月—1945年8月)

党史

许多爱国教师利用课堂教学等各种有利条件，向学生灌输反日爱国思想，激发学生的民族主义情感，自觉抵制日伪的奴化教育。其典型代表就是先后在梨树国高、四平师道学堂任教的谭宝珍。

谭宝珍，字希儒，1902年生于梨树镇。1922年在北京中文专科学校毕业后，在山海关田氏中学任教，后又先后出任安东中学、沈阳西沙岭中学和西丰中学校长。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激起了他对日寇的强烈愤慨，他毅然投笔从戎，参加了抗日队伍，兵败后，隐姓埋名回到家乡任教。1940年春，谭宝珍从梨树国高被调到四平师道学校担任国文教员。

在这残酷的白色恐怖下，谭宝珍给同学们讲授岳飞的《满江红》一词，以此激励学生“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”，抒发抗敌雪耻“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”的雄心壮志。

在谭宝珍的引导和影响下，在他任教的班级里形成了一个秘密的反日团体。他们时常在学校体育场南边的树林子里开会，研究具体的反日活动。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印发传单，扩大反日救国宣传，号召不辱作奴隶的人们行动起来，参加到抗日的行列中来。他们先后印发传单数千张，散发到全市各中小学以及机关、街道群众中去，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。

1942年12月7日早晨，四平女子国民高等学校（今三中校址）住生上自习时，发现临街教室被新打破的玻璃窗口下有一张纸，打开一看是用蜡纸印刷的传单，上面写着：“亲爱的同胞们，在今天这个日子里，请大家

想一想吧，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，受的是什么教育，忘掉了祖国没有？……”学生看完后，担心祸事临头，索性投到火炉里烧掉了。但事情并没有瞒得住，终于被伪警宪知道了，把三年级学生翟雅珍和高玉琴带到伪警察署，经过严厉逼问，一无所获。事情很巧，翟雅珍是伪四平市长翟书田的孙女，于是拘留一夜就释放了。

同日早晨，四平东国民高等学学生，在厕所附近也拣到传单。大家争相传阅，后被胆小怕事的丁国华舍匿知道了，报告给日本校长。日伪知道后，赶派警宪到学校，把住生全部拘禁于学校礼堂（走读生尚未登校），迫使学生们脱下衣服，肆意检查，所有笔记本和油印文件等均被拿走，以对照字迹和墨色。日伪警察们查看了每个教师的教案，对照笔迹，查看钢板蜡纸、油墨、油印机、印刷用纸，与反满抗日传单相对照，他们还调查教师这几天的行踪，结果他们枉费心机，什么也没得着。

这一天，四平师道学校同样发现了传单。学生在吃早饭时，校方下令，紧急集合，学生都集中到操场上。日本人大町校长上台讲话，他说：“昨天的夜里，有人向我校撒传单，谁的拣着啦！快快承认的好。”特修科二年级级长张凤起站出来说：“我拣着了，放在桌子里还没有打开，

不知道是什么内容。”他回到教室拿来传单，交给了学校。这时，日伪警宪已经把学校包围起来，严禁人们出入，追根问底，终于把特修科二年级这个班全体学生带走。过几天后，多数学生被放回来了，仍扣押张凤起等5名学生，接着又逮捕了语文教师谭宝珍。

四平中等学校师生的爱国行动，激怒了日伪警宪和特务，他们到处搜捕，尤以师道学校为重点。凡是中国教师和学生都是他们监视的对象。不时传讯，百般恫吓。一听到校门外的摩托声，令人预感到没有好事。平日静穆的校园，顿时变成阴郁恐怖的世界。

1942年12月的一天，谭宝珍和许多同学被捕。在四平宪兵队，谭宝珍受尽了酷刑，但他始终坚持说：“散发传单是我一个人干的，和学生并无关系，要杀要剐，你们随便好了！”

一次，家人去看他，他嘱咐家人说：“你们不要花钱为我活动了。我决心已定，此生没有什么大事，只以一死报效中华。若能唤起民众，我死不足惜。”

后来谭宝珍被移到伪新京监狱，在这里，他又多次惨遭酷刑折磨，致使牙齿全部脱落，伤痕累累。1944年9月1日，谭宝珍被杀害，时年42岁。（未完待续）

